



李钊/文

敦煌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也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。这一处令无数人前往寻梦古今的国家宝藏，不仅投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的荣辱沧桑，更储存着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记忆。《寻梦与归来：敦煌宝藏离合史》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，全书分为《伤心敦煌》《四海寻梦》《魂兮归来》三编，如果说上编《伤心敦煌》回顾百余年来敦煌宝藏颠沛流离的往事，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，中编《四海寻梦》梳理中国学者呕心沥血在世界范围内搜罗资料，加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往事，是一部追寻和研究国宝的寻梦历程，那么，下编《魂兮归来》所聚焦的敦煌学正式延伸为敦煌吐鲁番学，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历程，则是一部接力研究、让宝藏魂归故里 的奋斗曲。

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与偶然的焦点，并互相交织。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，王道士无意间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神秘面纱，发现大量佛教经卷、社会文书、刺绣、绢画、法器等珍贵文物，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，这原本是历史的偶然事件。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里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、八国联军的入侵、文物保护意识淡薄、经费短缺等问题的存在，让斯坦因、奥勃鲁切夫、伯希和等外籍人士以考古、教育、学术交流等名义劫掠走大量文物，让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，令国人扼腕痛心。或许，敦煌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。所幸，纷乱的年代里，总还有一些清

醒而坚定的人，著名学者罗振玉提请学部将敦煌藏经洞剩余经卷收归国有，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失，王国维、蒋斧等学者出版《鸣沙石室艺术》《敦煌拾零》等著作，刘复、胡适、王重民、向达、姜亮夫等满怀爱国热情的学者，或抄写、或翻拍，将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带回国内加以研究，更有郑振铎、傅芸子、孙凯、陈垣等大师级学者，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领域，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拦历史前进的脚步，从动荡到存亡，从寻梦到归来，敦煌宝藏经历过艰难而又辉煌的过往，折射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。敦煌学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门显学，但在很长时间里，因为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，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，曾一度流行的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国外”的说法，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隐痛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在季羡林、段文杰等学者的带领下，中国学者接力奋斗，战胜文献资料不易获得、研究技术水平落后等困难条件，取得了十分辉煌的研究成果，先后创办《敦煌研究》《敦煌学辑刊》等学术刊物，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，将敦煌学正式延伸为“敦煌吐鲁番学”，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，成为当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的中心。历史滚滚向前，当数字化、全球化的时代到来，我国在加强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，自1994年起，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，中国加强与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国际合作，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，使流散海外的



敦煌文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“魂归故里”，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全球共享，使敦煌宝藏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保护，成为人类的敦煌，世界的敦煌学。

一眼千年的敦煌，它的故事不是一部《寻梦与归来：敦煌宝藏离合史》所能讲完的。回望敦煌的曲折发展，所触尽是中国人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，而走近敦煌，感知不尽的情怀，正是为了延续守护和研究敦煌的故事，描绘未来的美好画卷。

# 讲不完的敦煌故事

## 读《寻梦与归来：敦煌宝藏离合史》



# 云中时有尺素来

## 读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

赵佩蓉/文

1949年10月，海莲，以创作电视、舞台剧本为主的自由撰稿人，写下一封信，声称不能容忍那些乱七八糟的遭遇书，抱怨在纽约总买不到想读的书，并罗列了一张求购清单。收信地址是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，一家旧书店。不带任何希望的求助信，成为一段传奇的开始。此后，英国卖书人弗兰克专心致志地为海莲寻觅古籍珍本。求书、寻书、邮寄、道谢，买书人和书店店员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交集。后来，弗兰克的同事、家人、邻居也加入通信的队伍。双方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1969年1月，弗兰克去世。

书，作为媒介，将海莲和弗兰克联系在一起。对于粗糙的书，海莲会直言，这算哪门子《新约》啊？是哪个家伙出的馊主意，把通俗拉丁文圣约整成这副德行？弗兰克则是尽可能找到符合海莲要求的书。阅读品味高度一致，弗兰克推荐的书籍总能打动海莲。对于珍爱的书，给予恭敬的态度，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前，整天陪伴。海莲说，我捧着它，生怕污损它那细致的皮装封面和米黄色的厚实内页。海莲的言行，唤起我们对好书的珍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被称为“全世界爱书人的圣经”，一点也不为过。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是一本私人书信集，它展示了人与人之间最理想的交往方式。铺笺提笔，表达诉求，署名缄封，投进邮筒，书信真是神奇的载体，可以穿越万水千山，将远隔重洋的两个陌生人实现有效联接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个写信，一个回信；一个求书，一个售书，维系20年情缘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从容纯洁。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，他们在短信中也谈工作谈家庭谈时事。双方的真诚坦率，是对生活不易的一种倾诉，也是对孤独心灵的抚慰，本质是展现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，然后通往对方的内心，引起同频振动。当然，这种情形也会扩展到具体生活。二战结束后，美国物质充裕而文化资源短缺。伦敦百废待兴，物质实行配给制，市民生活艰苦。海莲主动给店员寄了火腿、香肠和鸡蛋，让他们吃到很久没见过的完整而大块的肉。她给弗兰克的妻子邮来丝袜。海莲的举手之劳，恰是给弗兰克的“雪中送炭”，这种超越了求购者和售书者的情谊，正是人世里的温暖和感动。

我们可以设想，友谊的小船，能够顺利行驶几

十年，是需要双方共同维持的。如果是朝夕相处的亲近关系，会因为太接近彼此而理所当然地生出轻慢，很多心意一经道破，便索然无味。如果是素未谋面的陌生关系，往往会因为矜持或试探或权衡而小心翼翼。好书，本来不是急功近利的商品。因为好书联接起来的交往，好像一泓溪水，是有方向的，也是有缺口的。弗兰克多次邀请海莲，海莲也曾动了奔赴英国的念头。但直到弗兰克去世，两人都不曾谋面，以致海莲恳求书店还在那儿，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，请代我献上一吻。若即若离的距离，正是人际交往的舒适空间。这种灵魂高度契合的交往，正是对至美的接近与抵达。在朋友圈发问候、语音通话轰炸的时代，人际交往常常因为便利和随意而不被重视。我们因此愈加怀念笔尖滑过纸张的力度，信笺漂洋过海的长度，寄信回信传递的温度。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，全书不足百页，大多数信息没有超过800字，字里行间却跳脱出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，可以感受英美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小时候，常听大人念叨，什么树开什么花。同理，什么人说什么话。语言特点最能表现人物个性，暴露民族文化的烙印。海莲是直率幽默的美国女子。为一本欺世盗名的书发了飙，她会突然想起骄蛮，在信纸上对着弗兰克倾诉，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。春意渐浓了，她想读点情诗，对着信笺隔空喊话，我要那款款深情而不是口沫横飞的。该寄点什么给我，你自己动点儿脑筋。收到一本好书，她自诩，你们送给我的礼物，我朝夕相处，至死方休，我甚至还能将它遗爱人间而含笑以终。语言容易受外界的干扰。大部分语言表达，会因为多用譬喻用词曲折，衍生出很多言外之意。文字，却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内心世界。这些文字，没有矫饰，没有修辞。海莲就是这样的张狂、风趣。而弗兰克呢，呈现的是英伦绅士的守信和礼貌。他会为一直没能寄出海莲想要的书而感到抱歉，会因为延迟回信而郑重致歉，会因为收到的礼物包裹而一再感谢。这种彬彬有礼、带着内心平静的优雅，以致弗兰克始终没有逾越异性交往的底线，仅在临终的回信中，在落款的名字前小心地缀上“挂念您”三个字。

阅读这些信件是愉快的：不见字斟句酌的严谨，却可见丰富的内心世界。两三个小时的阅读量，地铁上、临睡前、午饭后，随手可以翻阅，根本不需要费心费力。

# 岁月过往皆为序章

## 读《活得明白》

甘武进/文

我违心地脱了背心。结果呢，我就成了那一天早市上的一景。我足足被围观了二十多分钟。是经我一再请求，才宣告结束的。在《活得明白》这本书中，女理发师傅用带功的推拿疗法帮梁晓声治疗肩颈的毛病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体会。他说，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大约总难免是要被人围观几次的吧。那种感受和他肯定是一样的。不过，无论大小，人是要有一些特殊体会的。有特殊体会，才有特殊感受；才会对别人，多几分理解，多几分仁义。

此书精选梁晓声知人论世的多篇代表性散文佳作集结而成。梁晓声所关注的大多是普通大众的集体情感，他以笔抵抗虚无，以小人物的故事歌颂善良，在浊世中坚守清名。在《我与文学》《关于好人、坏人》《被围观的感觉》《何以善良何以多种》等文章中，梁晓声从日常小事切入，讲述为人为文、处世的准则。他的关注点始终在红尘中的微小的个体。活得明白，绝不是教人庸俗的成功法则，而是要让人成为独立、正直的、堂堂正正的现代人。

采茶人徐阿婆，八十三岁了，一米六七的个子，腰板挺直，满头白发，不矜而庄。表现了一个典型的农村传统妇女的本色，不自傲，庄重，得体。她为了还清腐败官员救济她的钱财，辛苦劳作。看见徐阿婆往返于送茶路上，背着编补过的竹篓，竭力挺直单薄的身板。然而其步态，毕竟是那么的蹒跚，使我联想到衰老又顽强的朝圣者，去向我所不晓的什么圣地。一个刚直不阿、清正廉明、追求人性的善良与美好的老者让人震撼：世上真有如此高尚的人。

作者说：历史中和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的人，是难以简单地以好坏善恶来分类的。如曹操，他在判断力混乱的情况下，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；还一不做二不休，连沽酒归来的吕伯奢老汉也杀了，这是很罪过的行径，但又不能简单地便认定曹操是一个坏

人、恶人。同样是这个曹操，大军进发，马踏禾苗时，他不是体恤到了农民的辛苦，命令士兵绕路而行吗？人的一生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，每一个人都一个极大可能变化的个体。陶渊明都叹：千秋万岁后，谁知荣与辱？

我与薛健相识，已二十几年了。他知道有些底层的人们，由于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或不公平的对待，找到作者家里，希望能给予帮助。而我只不过是个写小说的人，教书的，做不了“及时雨”的，于是经常苦恼。薛健的收入并不高，家里的经济水平也不太好，但他给作者写信说：我的工资又加了些，我也有点儿能力帮助他人了。如果你认为某些找到你家的人真值得帮助，而你又能力有限，那么就把他们的地址抄给我吧！作者坦言：读罢那样一封信，心中温暖而怡然。

王妈妈今年七十六岁了。作者第一次见到她，她蹲着，正欲背起一只背篓到茶集中卖茶。她问作者：如果一个老人生了癌症，最长能活多久，最短又能活多久？作者以他知道的常识回答之后，王妈妈沉默良久，又问：活得越久，岂不是越费钱？作者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尤其是对这样一位七十多岁还辛劳不止采茶攒钱的老母亲。我死，就是因为病，估计也不会病得太久。我加紧再挣点儿钱，我可不愿拖累儿女们，儿女们各有各的家，也都不容易。作者明白了：为什么他的某些同代人，一提起自己过世了的父母就泪眼涟涟。

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让人们改变了很多，但梁晓声式的慷慨陈词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。人们仍然可以从梁晓声这里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，他仍然能够给他的读者想要的东西，从《活得明白》到《人世间》，梁晓声对为人处世有深刻的理解。那些岁月过往，皆为新篇序章。《活得明白》是对生活、对文学、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探问，为郁闷的、迷茫的读者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向：活得明白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

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